

# 共同体视域下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饰交流

刘瑜, 赵宇, 刘慧慧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以中外古代经典历史文献为主要引证素材,从政治外交、宗教文化、商贸往来等影响因素着手,论述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饰交流与互鉴,揭示两者在穿着观念、服饰制度、装扮形式等方面的趋同现象,探讨这种跨越国别、地域、民族的服饰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以及其中表现出的官方与民间、单向与多向、制度与形式并存的文化交流特征。研究表明,这种趋同现象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案例,补充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史的内容,并重新定义了服饰交流的意义,构筑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区域影响力的新版图。

**关键词:**明代;东南亚;服饰;交流;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5)02-0166-06

## Clothing Exchange Between M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LIU Yu, ZHAO Yu, LIU Huihui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ancient classi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s primary evidential sources. Starting from influential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diplomacy, religious culture and commercial interactions,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influences in clothing between M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research revealed convergent phenomena in clothing concepts,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decorative form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hile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pathways of clothing communities that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It particularly examined the coexisting cultural exchange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ed through official-civilian interactions, unidirectional-multidirectional flows and institutional-formal synthes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se convergent phenomena serve a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cases in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upplemen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n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ile redefinin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artorial exchanges, and delineating a new cultural landscap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regional impact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outheast Asia, costume, exchange, Maritime Silk Road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及《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2022—2025)》等一系列国家级战略计划的发布和执行,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的典范,也是推动构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收稿日期:2024-11-20; 修订日期:2025-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4BG145)。

作者简介:刘瑜(1970—),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服饰设计理论与文化比较。

Email:liuyu32@dhu.edu.cn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便已开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流。长期以来,东南亚各国在中华文化的辐射作用下,逐渐形成跨国别、跨地域、跨民族的一体化格局。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类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特别是在明朝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的推动下,中国与东南亚诸多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宗藩关系,并在官方的支持下开展了朝贡贸易;与此同时,民间的各种商贸和文化交流亦十分频繁。在此影响下,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饰交融互鉴现象频现,并在服饰观念、制度、形式等多方面呈现趋同之势,形成了基于共同认知的服饰共同体现象。

目前,学界几乎未见专注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服饰交融的研究及成果,而主题较为相近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类:①“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融的相关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丰硕,重点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领域及其相关的技术、艺术和文化,如《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sup>[1]</sup>、《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sup>[2]</sup>等,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服饰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服饰的研究涉及极少。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的相关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较为宏观的视角探讨文化的传播,如《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sup>[3]</sup>、《中国文化在东南亚》<sup>[4]</sup>、《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海域交流(15世纪末—20世纪初)》<sup>[5]</sup>、《全球礼物:早期近代亚欧外交中的物质文化》<sup>[6]</sup>。综上,尽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在多年前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但几乎未见涉及服饰领域的相关成果。具体来看,此“学术洼地”中涉及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服饰文化交融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针对亚洲海域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服饰身份认同的研究仍显薄弱;专门针对服饰相关的稀缺性史料进行系统性挖掘、整理、论证的成果仍为空白;围绕共同体意识及全球史视角探讨物质及文化互动的研究相对欠缺,即包括服饰在内的物质文化的作用、地位、价值和影响仍被学界所忽视。因此,文中以服饰为切入点,以“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明代中国为例,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的服饰交流,探究中华文明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影响和贡献,从而论证“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服饰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历史形成。

## 1 政治外交影响下的服饰交流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主要基于

朝贡贸易(见图1<sup>[7]</sup>)。朝贡是指朝贡国向宗主国修职纳贡,并接受宗主国的朝覲、册封与赏赐<sup>[8]</sup>。明朝曾颁布“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不仅建立了“明尊卑、辨等威”的服饰制度,还将“赐服”这种特殊的政治手段应用于维系宗藩关系中<sup>[9]</sup>。



图1 《职贡图卷》之安南国

Fig.1 Kingdom of Annam from Scroll of Tributary States

随着明代朝贡贸易的持续推进,东南亚各国普遍给予积极回应,尤以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地区)为代表。永乐九年(1411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刺亲自率领使团奉表朝贡。此举备受明代统治阶层重视,他们将服饰和纺织品赏赐给国王、王妃和使臣等人。相较而言,满刺加所获赐服的数量、等级、品种均远胜他国(见表1)。赐服的形制包括袍(圆领袍、交领袍、直领袍)、衣(交领衣)、裳(男子裳、女子裳)、裤等;纹样包括龙纹、蟒纹、麒麟纹、云霞翟纹、五章纹、胸背补子纹、骨朵云纹等;材质包括丝绸(缎、锦、纱、罗、绫、绢等);装饰工艺包括饰金(织金、浑金、销金)、妆花、刺绣、镶嵌、刻镂等<sup>[10]</sup>。

明朝统治者的赏赐不仅具有政治外交目的,还能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由此激发满刺加对中华服饰的向往之心,致使其屡次遣使请求赏赐。例如,正统十年(1445年),满刺加使臣乞赐冠带,并为其国王请赐蟒龙服<sup>[11]</sup>。这是史料记载中满刺加第一次向明朝请赐冠服,此行为反映了该国对中国服饰的认同和向往之意,是基于共同认知条件下服饰共同体构建的完整表现。自此,满刺加时常派遣使臣朝贡,明朝亦派使臣前往满刺加进行诏敕或册封,双方的外交关系愈发紧密。明朝通事(翻译官)杨林曾学习马来语(当时公认的区域语言),以求能够更加便捷地交流与沟通,他用中文校正了全世界第一本马来语词典《满刺加国译语》<sup>[12]</sup>。多方影响下,满刺加的服饰文化开始呈现“中国特色”。据《马来纪年》<sup>[13]</sup>所载:“王苏丹·穆罕默德·沙(苏丹芒速沙)先是规定黄色为国王御用颜色,民间不

能使用黄色手巾……黄色枕套、黄色托盘衬布及黄色首饰包裹布。”“平民不管地位多高,不能戴金脚环,也不能戴金质点银的丝镯。任何人,不管他怎样富有,不能佩戴金饰,但国王一旦恩准,就可永久佩戴了。”“至于出门时所撑的罗伞,白罗伞最高贵,为国王专用;黄罗伞归王子专用;紫罗伞、红罗伞和绿罗伞则归侍臣、传诏官和武将专用;蓝罗伞和红罗伞则是受册封的人均可使用。”“国王封官授爵

时,……册封宰相赐锦衣、纱龙、头巾、肩带和腰带;册封王子、大臣或贵族时,比宰相少腰带;册封传诏官、侍臣或武将时,赐锦衣、纱龙和头巾。”“王苏丹·穆罕默德·沙将满刺加变成了一个大国之邦,……并赐给锦绣衣袍。”由此可见,满刺加的服饰制度逐渐呈现趋同于中国之势。明代丝织品在满刺加极受统治阶级的推崇,他们以黄色为贵,尚金银,封官授爵时亦会赏赐锦衣。

表 1 《大明会典》记载永乐年间赏赐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服饰和纺织品  
Tab.1 Costumes and textiles granted to some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od recorded in *Da Ming Huidian*

被赏赐者	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	淳泥(今文莱)	苏禄 (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古麻刺朗 (今菲律宾棉兰老岛)
国王	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织通袖膝襴,金镶玉带二,锦、绮、纱、罗三百匹,绢千匹,浑金文绮二	冠带,金织文绮衣一袭,金绣文绮衣一袭,锦四段,绮、帛、纱、罗八十匹	袭衣,冠服,金绣蟒龙衣一袭,麒麟衣一袭,金镶玉带一,罗、锦、文绮二百匹,绢三百匹	冠带,文绮、纱、罗,金织袭衣
王妃、王母	冠服(王妃),金织文绮、纱、罗衣四袭,锦、绮、纱、罗、绢六十四	冠服(王母)		冠服(王妃)
使臣等	冠带,文绮、纱、罗袭衣,彩幣	冠带,彩幣	冠带,金织文绮袭衣,文绮、彩绢	彩幣表里

注:“幣”为“币”的繁体,在古代指用作贡品的丝织品。

## 2 宗教文化影响下的服饰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宗教领域的交流与互动尤为紧密,特别是安南(今越南)深受中国宗教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行政法典、礼乐文化都曾在安南盛行,儒家思想更是深入安南并得到推崇。《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早在李英宗大定十七年(1156 年),该国已设立孔子庙<sup>[14]</sup>。后黎朝建立后,大兴儒学。绍平二年(1435 年)二月五日,黎太宗:“命少保黎国兴释奠于先师孔子,后以为常。”<sup>[15]</sup>明景泰三年(1452 年),到访中国的使臣还曾奏请拜谒孔子:“安南国陪臣程真等奏欲拜谒先圣孔子于国子监,从之。”<sup>[16]</sup>与此同时,众多的儒家经典也在安南广为传播,如《左传》《性理》《氏族》《唐书》《汉书》等<sup>[17]</sup>,这些书籍的内容还出现在安南的科举考试之中。由此可见,安南可以归属于儒家文化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安南的影响极为深远。

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及汉文化的影响,安南在服饰装扮上亦采用汉制,并不断接受中原的衣冠文化,主动启用中国的衣冠制度。例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明代确立补服制度,安南随之也开始

施行以补子分品级的官服礼制。安南文献中记录的补子最早使用时间为黎圣宗光顺七年(1466 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sup>[14]</sup>记载:“颁补子绘图,凡禽兽法象,公、侯、伯、驸马并文武正品画一,从品画二,风宪堂上司画一,分司画二,云河、山水、葩木诸样,繁杀不拘,以五彩彰施于五色绉绣金线,听各从宜。”黎圣宗洪德二年(1471 年)九月,对补子的使用又给出详尽解释:“闰九月,定衣服补子制度。上谕之曰:朝廷乃礼乐之地,衣服为章彩之文,名分截然,诂宜爽越。故舜观古人,以章施其五采;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舜、禹圣人,不以衣服为末节,必于此乎存心。后世为人君、为人臣者,可不于此致谨乎。我国家抚安区夏,稽古礼文,上下章服,文禽武兽,古有制矣。贵贱等仪,不可逾僭,旧有禁矣。夫何有僚莫辨,视国家制度为虚文;庶民犯法,以纒丝织金为常服。尔官员百姓等,其听朕言,文武职官章服胸背,一循定制。百日之内,不依制者,降级治罪。”<sup>[15]</sup>十月的规定则在光顺七年(1466 年)所颁布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冬十月,颁花样补子画图。凡禽兽色物,公、侯、伯、驸马并画一,文武正品画一,从品画二,风宪堂上官画一,分司画二。云河、山水、花木等件,繁杀多少,随意制作,不拘泥

青黄赤白金碧绿等彩色。官样从宜绣造,亦不必一概。金线如云河,如山水,禽兽用金线亦许。”<sup>[15]</sup>

黎宪宗景统三年(1500 年),安南颁布了具体的补子样式。根据《明史》与《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记载,将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与安南黎宪宗景统三年(1500 年)的文武官补子纹样进行对比,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以看出,景统时期补子纹样的规制与洪武时期略有差异:①补子中的禽兽种类少于洪武时期;②文官二品至六品补子中的禽类品级均比洪武时期低一个等级;③文武官员的品级划分不够详细,六品以下文官全部用白鹇,武官用象;④武官三品的补子用白泽,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地位崇高的神兽,象征祥瑞,洪武时期仅为公、侯、驸马、伯所用<sup>[18]</sup>。总体而言,伴随明代中期补子样式的几次调整,直至 16 世纪初,安南补服的规制才趋于完备。该国在吸收明代多个时期补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官袍等级体系。

表 2 明洪武二十四年与安南黎宪宗景统三年文武官补子纹样

Tab.2 Patterns of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 rank badges from the Ming Hongwu 24th year and Annam king Lê Xianzong Jingtong 3rd year

品级	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		安南黎宪宗景统三年 (1500 年)	
	文官	武官	文官	武官
一品	仙鹤	狮子	仙鹤	狮子
二品	锦鸡	狮子	仙鹤	狮子
三品	孔雀	虎豹	锦鸡	白泽
四品	云雁	虎豹	孔雀	虎
五品	白鹇	熊罴	云雁	豹
六品	鸳鸯	彪	白鹇	象
七品	鸂鶒	彪	白鹇	象
八品	黄鹌	犀牛	白鹇	象
九品	鹌鹑	海马	白鹇	象

### 3 经济贸易影响下的服饰交流

经贸往来同样促进了纺织和服饰技术的交流。以明代中国称雄于世的丝织品和丝织技术为例,东南亚各国通过与中国的交往,持续学习练丝技术,使当地工匠的丝织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安南人曾在陈朝时期(1225—1400 年)向中原汉族学习练丝技术。“汉苍禁天下诸人,不得用熟捣绢为衣,止许略捣。”<sup>[15]</sup>时至后黎太宗绍平六年(明正统四年,即 1439 年),安南的丝织技术可达到“每丝一斤织绢一匹”,绢的尺寸可达“缕长三十尺(约 690 cm),阔一尺五寸(约 35 cm)以上”<sup>[15]</sup>。得益于同中国工匠的频繁互动,后黎朝末期安南的丝织水平显著提升,

并达至相当高的水平。《西清笔记》记:“安南所进绢布皆极细。”<sup>[19]</sup>

当中国向东南亚各国输入大量精美的服饰制品、推广完善的制度体系、传播先进的工艺技术之时,东南亚各国亦将各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原材料带到中国,丰富了中国服饰原料的品类。明初,朝廷规定:“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门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sup>[20]</sup>伴随朝贡贸易的日益兴盛,各藩国常向中国进献本地土产和珍奇宝物,这些异国特色产物同时也进入中国的商贸交易之中,影响了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服饰原材料之一的苏木主要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包括真腊、暹罗、占城、安南、爪哇、苏门答腊、苏禄、满刺加等国。明代官方记录中第一次提到东南亚国家进献苏木的时间为洪武五年(1372 年)<sup>[21]</sup>。彼时正值暹罗(今泰国)第 3 次奉表朝贡,使臣宝财赋将苏木等礼物献给明太祖,自此,暹罗频繁地进献苏木。《西洋番国志》“暹罗国”条目:“其苏木贱如柴薪,且颜色绝红,胜他国所出者。”<sup>[22]</sup>由此可见,暹罗所贡苏木的数量最多、质量最佳。苏木可作为染料和药材使用,《寰宇通志》记:“苏木,一名多邦,色可染红。”<sup>[23]</sup>作为媒染染料,苏木染色需借助不同媒染剂,方可染取木红、乌红、绛色、朱色、绯色、赤色、褐色等。明代的服饰制度存有“尚红”之说,“红色”在官袍的色彩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定,文武官朝服需用赤色;一品至四品公服为绯色;公、侯、伯、驸马的公服与一品相同,亦用绯色<sup>[24]</sup>。这些“红色系”官袍均可使用苏木染制,由此说明苏木是明代宫廷服饰制作的重要原料。

此外,大量纺织品虽非原产自东南亚,但由东南亚各国传入中国,这些纺织品同样丰富了中原地区的服饰款式和纺织品种类,其中尤以西洋布为代表。西洋布是一种原产于印度的细棉布,《西洋番国志》“古里国”条目:“西洋布,本国名扯黎布,出于邻境坎巴姨(今印度喀拉拉邦西部的科因巴托尔)等处,每匹阔四尺五寸(约 104 cm),长二丈五尺(约 578 cm)。”<sup>[22]</sup>《大明一统志》卷 90 有:“西洋古里(今印度西南岸之科泽科德)土产西洋布”<sup>[25]</sup>(见图 2<sup>[26]</sup>)。《濯缨亭笔记》称:“西洋布,幅广有至四五尺(约 92 ~ 115 cm)者,出海外琐里、锡兰山诸国。”<sup>[27]</sup>《古今事物考》记:“西洋布,其白如雪,阔七



八尺(约162~185 cm)。”<sup>[28]</sup>由此看来,今印度地区所产西洋布的特点是宽幅、呈雪白色。从13世纪起,西洋布就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一种十分重要的贸易货品,其既可以满足当地市场之用,也能进行转卖或用于朝贡。明代时,中国的西洋布主要源自浣泥、满刺加和暹罗等国的进献。例如,洪武三年(1370年)和洪武四年(1371年)浣泥先后两次贡西洋白布<sup>[21]</sup>;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满刺加贡西洋布<sup>[29]</sup>。1979年,江西南城发掘的明代益宣王朱翊钊(1537—1603年)及其李、孙二妃合葬墓中,朱翊钊棺内发现题有墨书西洋布字样的白细棉布。由此看来,通过东南亚国家进入中国的西洋布在明代颇受欢迎,甚至成为贵族阶层的陪葬品。



图2 《职贡图册》之西洋古里国

Fig. 2 Kingdom of Calicut in the Western Ocean from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States

## 4 多因素影响下服饰共同体的构建及特征

服饰作为与人类生活亲密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具备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折射出不同时代的认知观念与思想体系<sup>[30]</sup>。这种非语言的人类符号系统承载着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的文化价值。服饰交融不仅是简单的物质形态借鉴,更是制度文明的跨域传播、图案纹样的地域流变、材料工艺的群体迁移。这一文化现象既展现了社会互动中的传播机制,又折射出人类在共同认知框架下对服饰符号的外化实践。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形成了具有认知共性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在服饰领域的具象化表现尤为显著。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相关古籍文献的记载,类似“穿唐衣”的服饰交融现象在东南亚各地频现。例

如,《诸蕃志》“交趾”条目:“服色饮食略与中国同,但男女皆跣足差异耳。”<sup>[31]</sup>《岛夷志略》“交趾”条目:“男女面白而齿黑,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袜方履。”<sup>[32]</sup>《西洋番国志》“暹罗”条目:“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sup>[22]</sup>《瀛涯胜览》“占城”条目:“国王系锁俚人,崇信释教,头戴金钗三山玲珑花冠,如中国副净者所戴之样。”<sup>[33]</sup>《殊域周咨录》“浣泥”条目:“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王之服色略仿中国。”<sup>[17]</sup>上述记载中提及的交趾、暹罗、占城、浣泥等地分属时下的越南、泰国、文莱等国。由此可见,中国服饰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极其深远。需要强调的是,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饰交融互鉴不仅体现在服饰形制、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还体现在服饰制度和礼法章程上,并自此形成了基于共同认知的服饰共同体。该服饰共同体跨越了国别、地域、民族,并展现出以下3大特征:

1)官方与民间并存。一方面,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宗藩关系”是服饰交流的基石,在此过程中,服饰等纺织品成为最重要的媒介物;另一方面,睦邻友好同样促进了民间交往,宗教传播和商贸往来成为明朝与东南亚国家服饰交流的重要渠道。诸如民间市场对异域商品的需求、商业利益的驱动以及匠人技术的跨域互鉴,共同构成了服饰文化交流的深层动力机制。

2)单向与多向并存。一方面,明代中国在社会发展、文明礼教、科学技术等方面普遍领先于东南亚国家。在此背景下,东南亚诸国大多对中国服饰呈现出仰慕之意,正如《明太祖实录》所言:“远夷之人,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sup>[21]</sup>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东南亚国家出产(或经由东南亚国家转运)的大量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对中国服饰的贡献亦不容小觑。

3)制度与形式并存。一方面,服饰交融的具体内容涵盖服饰色彩“尚红观”、官员补服的纹章制度、丝绸织造的工艺技术、服饰配件的等级规定等维度,这些要素通过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服饰实践,持续影响着东南亚国家的服饰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服饰的形制和规制呈现出从内容到形式、从细节到体制、从服饰审美到穿着观念的多层次交融与互鉴。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反映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服饰上的高度一致性,因而奠定了构建服饰共同体的基础。

## 5 结语

文中从政治、外交、宗教、文化、经济、贸易等多

视角考察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饰交流及互鉴,探讨其展现出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服饰交融景象,揭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长久以来形成的跨越国别、地域、民族的服饰共同体现象。由此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饰交流及互鉴,既是对“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史的重要补充,也为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全新且宝贵的历史依据。在服饰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重新审视服饰文化交融的历史价值,更能促进文化自信的提升与多元文明的共生互鉴。

参考文献:

[ 1 ] 赵丰. 锦程: 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

[ 2 ] 常沙娜. 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 3 ] 陈炎.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4 ] 杨保筠. 中国文化在东南亚[ M]. 2 版.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 5 ] 松浦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海域交流: 15 世纪末—20 世纪初[ M]. 孔颖, 编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8.

[ 6 ] BIEDERMANN Z, GERRITSEN A, RIELLO G. Global gift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 M]. 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7.

[ 7 ] 故宫博物院. 故宫名画记: 仇英职贡图卷[ EB/OL]. [ 2025-03-25 ]. <https://minghuaji.dpm.org.cn/paint/detail?id=f0a75a7fd09344ec88b228601a52c42b>.

[ 8 ] 郑淑方. 万国衣冠拜冕旒——职贡图的形式风格及其意涵[ M]. 台北: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9.

[ 9 ] 刘慧慧, 刘瑜. 从赏赐琉球官生的服饰看明朝外交[ J]. 服装学报, 2023, 8(1): 59-63.  
LIU Huihui, LIU Yu. Diplomacy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given costumes of Ryukyu students [ J ].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1): 59-63. ( in Chinese )

[ 10 ] 刘慧慧. 明朝对满刺加国的赐服研究[ D]. 上海: 东华大学, 2022.

[ 11 ] 李时勉. 明太宗实录[ M]. 影印本. 台北: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12 ] 安焕然. 小国崛起: 满刺加与明代朝贡体制[ 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9.

[ 13 ] 敦·斯利·拉囊. 马来纪年[ M]. 黄元焕, 译. 吉隆坡: 学林

书局, 2004.

[ 14 ] 潘清简.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15 ] 吴士连. 大越史记全书[ M]. 标点校勘本.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16 ] 柯潜. 明英宗实录[ M]. 影印本. 台北: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17 ] 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 M]. 余思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8 ] 赵宇, 刘瑜. “去武图存唐社稷, 安刘复睹汉衣冠”——从清代《万国来朝图》中安南国使臣着明制常服谈起[ J]. 海洋史研究. 2023(1): 49-67.  
ZHAO Yu, LIU Yu. " Plan for the survival and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looking forward to reproducing the glorious scene of wearing Han-style clothing"—Annam diplomats wearing the daily official uniform of Ming Dynasty is depicted in the *Portraits of Many Countries Coming to Diplomacy in Qing Dynasty* [ J ]. 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 2023(1): 49-67. ( in Chinese )

[ 19 ] 沈初. 西清笔记: 卷 2[ M]. 刻本. 吴县: 潘氏刻功顺堂, 1884 ( 清光绪十年 ).

[ 20 ] 王圻. 续文献通考: 卷 31[ M]. 刻本. 松江府: [ 出版者不详 ], 1603 ( 明万历三十一年 ).

[ 21 ] 张辅, 杨士奇. 明太祖实录[ M]. 台北: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22 ] 巩珍. 西洋番国志[ M]. 向达,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23 ] 陈循. 寰宇通志: 卷 118[ M]. 内府刻本. 北京: [ 出版者不详 ], 1456 ( 明景泰七年 ).

[ 24 ]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5 ] 李贤. 大明一统志[ M]. 影印本.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0.

[ 26 ] 俞建良. 昆仓堂美术馆藏书画( 人物卷)[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

[ 27 ] 戴冠. 濯缨亭笔记: 卷 9[ M]. 华察刻本. [ 出版地不详 ]: [ 出版者不详 ], 1547 ( 明嘉靖二十六年 ).

[ 28 ] 王三聘. 古今事物考: 卷 3[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29 ] 佚名. 明宪宗实录[ M]. 台北: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30 ] 刘瑜. 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8, 46(2): 10-16.  
LIU Yu. Study on the cultural blending of th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ume [ J ].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 2018, 46(2): 10-16. ( in Chinese )

[ 31 ] 赵汝适. 诸蕃志校释[ M]. 杨博文, 谢方,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32 ] 汪大渊. 岛夷志略校释[ M]. 苏继庠,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3 ] 马欢. 瀛涯胜览校注[ M]. 冯承钧, 校注.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9.

( 责任编辑: 沈天琦 )